·专题研究·

DOI:10.20004/j.cnki.ujn.2025.03.015

中国式现代化为何要融纳“传统”?

——兼论《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

张道奎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对待现代,是在古今中西之间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大时代命题,但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为何必须要融纳“传统”仍缺乏深刻论述。《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以下简称“对谈录”)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集中讨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这对于如何处理上述问题具有启发意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西方式现代化在本质上是由资本组织的,这导致了一些弊端;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就是试图在西方模式之外、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做出新的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纠正西方式现代化的弊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于中国“传统”的独特智慧。中国式现代化要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来开辟理论道路,通过“第二个结合”来开辟实践道路,进而建构融通“传统与现代”的中国式方案,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式现代化;“第二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D261;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5)03-0176-06

如何在古今中西之间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当代中国的道路建设、理论建设、文化建设、话语体系建设等所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①。从“中国式”与“现代化”的关系来看,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问题②;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则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问题③。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者、参与者与推动者,王蒙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传统文化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具有诸多基于切身经验的深刻思考;王学典则利用历史学家的敏锐洞察力审视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文化问题,进一步提炼出“如何对待现代、如何对待传统”④的核心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项目编号:17ZDA196);山东省博士后创新项目“选择性表达理论视域中的民国儒学转型研究”(项目编号:SDCX-RS-202400016)。

[作者简介]张道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哲学博士后,历史学博士,邮箱:echors@163.com。

①习近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求是》,2025年第1期。

②相关讨论参见沈湘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传统文化根基》,《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孙正聿:《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等等。

③参见赵昌文,卢中伟:《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红旗文稿》,2024年第22期;戴木才,卢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推进和理论创新——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戴木才教授》,《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4年第4期,等等。

④王蒙,王学典:《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页。

题。本文从上述研究视角出发，试图进一步回答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必须要融纳“传统”，并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建构在新时代的推进问题。

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现代化”的本质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新的现象”[①]，也为深入理解现代化问题的本质、明确“传统”在新时代中国道路探索中的重要性提供了新的契机。对于如何认识现代化尤其是西方式现代化的本质，如何深刻理解西方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别，是必须要首先明确的重大理论问题。

第一，“现代化”的根本追求是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发展，尤其是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对现代化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因而“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道路上去理解”[②]。周恩来在1954年9月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关于现代化的构想：为了摆脱新中国落后和贫困的状况，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和新中国的政权，我们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③]。学界一般认为这是“四个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早期表述。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逐步开展，毛泽东就反复论述了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又在1957年2月明确提出“现代科学文化”[④]的命题，进而提出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⑤]。“四个现代化”的表述，更在改革开放后被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被进一步强调。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⑥]，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总的来看，虽然“现代化”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内容有部分变化，但是其强调的核心“工业和农业”是不变的。也就是说，现代化在中国的核心要素“是工业文明，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⑦]，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第二，“现代化”在某一历史时期主要表现为“西方现代化模式”。在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命题提出之后，我们就必须要解释为什么西方式现代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破坏环境、毁灭人文传统的现象。在西方式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对土地的掠夺、对初级产品的掠夺，实现了生产原料的积累；通过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实现了资产原始积累。艾恺认为，“现代化对任何事物唯一的价值标准就是‘效率’”[⑧]，而这和资本的运作具有一致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的秘密，“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

①王蒙：《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自信》，《王蒙演讲录（2021—2023）》，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36页。

②王蒙，王学典：《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第200、150页。

③《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⑤邵雍：《毛泽东与中国式现代化》，《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7期。

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7日第2版。

⑦王学典：《资本与现代化：中国当下的方略与选择——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⑧艾恺：《持续焦虑：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15页。

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①]。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唯一的追求是利润,是经济效益。王学典据此在《对谈录》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发现:"在资本追逐利润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资本积累,不断扩大再生产,然后扩大市场,这是资本的生长机制。而在资本不断吸纳所有生产资料、所有资源,以滚雪球般重复、扩大上述循环的过程中,任何有利于资本扩张的东西都被吸纳进来,一切与资本增殖无关的东西都遭到了破坏。"现代化是由资本来组织及其破坏传统、破坏人文精神的这一本质特征,就连艾恺也尚未在相关著作中有明确表述。也就是说,"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就是把生产活动、经济活动都交给资本来组织"。"现代化—资本—追求(利润)效率—破坏传统与环境"这一机制的发现,深刻揭示了西方式现代化的本质,更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既想释放资本在组织生产、发展经济上的效益,同时又给资本划上一个道德界限、伦理界限,特别是法律界限与政治界限"的必要性所在。

针对现代化的消极影响,王蒙在《对谈录》中谈到"任何的发展都是有代价的",并且"在取得进步的时候必然带有失落";但是现代化更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是用电磨代替石磨的发展,是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的发展,它有力地促进了社会财富、社会生活的发展。所以"即使有这样那样的代价,但是不能不发展"[②]。这也是王蒙一直坚持的立场:"对人的关注本来是包括了对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关注的,就是说我们总不应该以叫人们长期勒紧裤带喝西北风,并制造美化这种状况的理论来弘扬人文精神。"[③]因而现代化道路仍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西方道路之外的现代化。正是充分认识到了西方式现代化是"把生产活动交给资本来组织"这一特性及其由资本造成的一系列消极后果,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也由此凸显。在经济生产上,"我们不仅要高效率,我们还要尽可能地平等"。中国式现代化不能把组织经济活动的主动权都交给资本,"政府也要参与组织,共产党必须要组织生产,必须要参与这些活动",这是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在政治建构上,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西方民主宪政之外的现代化。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中国共产党"重建了能够维护大一统局面的稳定的核心力量",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探索中国式民主。在环境问题上,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防风固沙、黄河治理的生态建设和人居环境建设,坚决不走西方式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我们既要金山银山,我们也要绿水青山。"[④]在文化与文明问题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历史中国延长线上的中国道路,是赓续传统的现代化[⑤]。同时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开新,就意味着我们正在自觉避免西方式现代化"对社会的传统礼俗、民族文化的继承等所造成破坏"的"一个古典意义上的悲剧"[⑥]。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之间有着重大差别。

正是明确了西方式现代化的"资本"本质和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独特追求,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传统"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所具有的特殊价值。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既然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那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凭藉的思想资源是什么?或者说,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独特性因何而体现出来?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何一定要融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6页。

②参见王蒙,王学典:《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第196-199页。

③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论文学与创作》(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④王蒙,王学典:《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第95-96、197、104、96页。

⑤王蒙,王学典:《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导论),第5-6页。

⑥艾恺:《持续焦虑: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2、345页。

纳“传统”的根本原因。

首先，世界文明发展史充分说明，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离不开“轴心突破”时期所创造的基本价值原则[①]。“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②]也就是说，回望轴心期的智慧是人类文明更新的重要方式，轴心期思想成果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坐标系。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仍需要从中华民族的“轴心期”思想结晶中汲取资源，并以其为坐标系给予当下和未来发展的方向性定位[③]。如果中国现代化失去了轴心期的坐标，就是失去了中华民族自身的价值准则，那就只能沦为其它现代化模式的附庸，最终沦为其它文明的附庸。中国在轴心期所创造的独特智慧，集中体现在东周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中。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能够纠正西方式现代化的弊端。中国式现代化要重建价值观、重建新的秩序追求，他不能是凭空产生的，必须要有凭借，有足够的现成的东西以供借鉴。正因如此，王学典指出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在中国的语境当中是意味着与现代化的弊端，与那种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告别”，“是要矫正现代化弊端的”[④]。而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人文精神的积极作用。孔子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⑤]，所关注的正是人类的幸福感受，重视人类社会的道德化，“我们倾向‘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我们认为利和义比较的话，应该把义放在前面”[⑥]。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崇尚德性的，是崇尚君子精神的。“儒家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建立在对德性的强调之上的”，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用大量的篇幅来论述君子的道德，君子的风度”。因而在德性问题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实际上是追求“将全体国民君子化、圣贤化”[⑦]。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人文主义，是一种德性文化，它关注的焦点在人的生活、人伦纲常、人类社会，这恰恰能够弥补西方式现代化模式在片面性发展进程中所抛弃的传统价值与人文精神，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独特之处。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面向、人间追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经验借鉴[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此岸性、实践性。传统文化最注重活着的世界，“让人们活得更好，要让个人、家庭、乡里、国族、天下更讲仁德，讲文明，行礼义，有秩序”；实践性更体现在儒家强烈的使命担当的思想中，儒家主张以天下为己任，最后的落脚点是治国平天下。正因执着于人间的秩序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核心都是围绕人类社会发展而展开的。也正因关注人类社会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特别崇尚变化的。“包括儒家在内的东周诸子讲秩序，讲此岸世界，讲社会未来，它是崇尚变化的。”《周易》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变易”，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庄子提出“与时俱化”，因而道家“也是能跟现代性相联系的”。而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变化形态。

总的来看，“回顾文化源头，传承文化命脉，融通古今精粹，包容中外英华，只有经过这样一番升华和处理，我们才能创造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今天一定要透彻理解、努力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所在”[⑨]。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作为三大社会发展理论之一而存在的，它将能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式民主政治改革，进

①参见王蒙，王学典：《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第112-113页。

②卡尔·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③王蒙，王学典：《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第112-113页。

④王蒙，王学典：《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第154页。

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71页。

⑥王蒙：《享受自己的文化》，《论文学与创作》（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5页。

⑦王蒙，王学典：《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第75、77、78页。

⑧沈湘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传统文化根基》，《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⑨王蒙，王学典：《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第70、93、133、135、67页。

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于中国数千年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的特殊智慧。

三、探索融纳“传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①,因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传统”与“现代”“中国式”与“现代化”的双向奔赴。通过以上讨论已经可以明确,中国道路与传统智慧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根本原因。那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探索融纳“传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呢?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要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来开辟理论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两个面向,而理论建构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融纳“传统”,进而融纳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经验。正如王蒙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很大一个意义,就是我们能够认真传承创新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中华文化有生命力的部分,传承中华文化的仍然在人性中活跃的部分”。在当代中国,“传统的复兴表面上是走向古代,但本质上是创造一种面向当下与未来、与西方自由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不同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具体要求之一。在国家治理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的层面上,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一种现代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现代理论形态;而作为前现代的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能与之直接相融纳。因此,“把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社会科学化的处理与冶炼,使这一文化、这一思想的精华进入到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框架中去”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只有经过这一理论重塑的重要环节,中国传统才能够“对治国理政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②,才能够实现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相互融纳,才能够在现代化建设中真正确立“中国式”内涵。

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科学化过程,就是“把传统文化纳入现行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之中”③,这同时也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实践。只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道路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活动才能够更好地把握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把握继承传统人文价值与接纳现代理性的关系。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要通过“第二个结合”来开辟实践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因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追求,而“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当下最伟大的社会实践。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道路的探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珍惜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与创造性地转变发展着新时代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认知与革新致用。而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理论引导。”④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更有实践性的面向⑤,具有实践形态,“现代化终于又大大激活了我们的传统,启发了我们应变与飞跃的智慧”。如果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德性文化和人文价值,那么马克思主义则是我

①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②王蒙,王学典:《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第155、160-162页。

③王学典:《中国文化内部各大板块之间应该展开对话——“凤凰国学”就“儒墨高端对话”访王学典教授》,《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7页。

④王蒙,王学典:《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第131页。

⑤王蒙一贯主张“实践性的人文精神”。参见朱自强:《论王蒙的现代性——以“人文精神大讨论”为中心的思想考察》,《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3期。

们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理论工具。“马克思的学说最能解释我们目前的大过渡时代”，“是我们目前这个社会特别是理论界不可缺少的一个分析工具”[①]。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需要在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融纳“传统”，因而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经由“第二个结合”来开辟实践道路，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探索融纳“传统”的具体方法。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就为如何恰当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作出了重要理论探索。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的著名判断，以及由此推导出的坚持“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②]与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吸收”[③]的主张，对于探索完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道路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而“现代化如果脱离了中国的传统，就变成了一个不得人心的现代化”[④]的观点，已经是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因而毛泽东在建构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时特别强调批判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传统，是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基本判断。

正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我们才能够在新时代明确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伟构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的当下形态，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⑤]。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只有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上才能够孕育新的文明形态。唯有如此，中华文明才能够在文明对话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普遍成果，融纳西方现代化的精华以及四大文明古国在轴心期所创造出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五大特性以及由此所具备的自信力、生命力、凝聚力和亲和力，是中国式现代化融纳“传统”、进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要文明特质。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内涵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纳方面，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道路和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脉络的“第二个结合”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担负着重大历史使命，它能够而且必须融通西方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互通、互鉴中探索一条前无古人的中国式新道路，进而创造出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是融纳“传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光辉前景。

四、结语

从理论建构方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问题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的属性，因而也需要跨学科的视野来分析、解答。王蒙、王学典以对话的形式集中探讨了中华文明特性、现代化的本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路径、中国道家思想的责任意识、中国现代化道路等问题，在求同存异中激发思想的火花，深化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建构中，我们更应该深入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一系列重大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建构一套完整的、融纳传统智慧与当下实践经验的一系列重要命题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责任编辑：马晓雪]

①王蒙，王学典：《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第84、127、12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④王蒙，王学典：《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第151页。

⑤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